

干部的家风因何很重要

■吴永进

近段时日,有关领导干部家风的报道引起不少人的关注。为何官员的家风问题会形成关注热点?这是因为较长一段时间来,民众耳闻目睹某些领导干部的腐败,往往发酵于家门之内,败露于屋檐之下,数年前就有分析统计指出,70%的贪污腐败案件所涉及的贿赂,都是由官员的老婆、孩子,甚至情妇收受。

因此,那些好家风的故事就越发令人怀念和称颂。主管经济工作26年的前国家主席李先念,不允许儿女经商,他严厉地对他们说:“你们谁要经商,打断你们的腿。”焦裕禄在临终前对妻子交代:“我死后,你会很难,但日子再苦再难也不要伸手向组织上要补助、要救济,你要把孩子们教育成为革命接班人。”这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家风。

闲来翻书,看到清朝曾国藩注重家风建设的故事,这位曾文正公为朝廷建功立业,可谓位高权重,却深知家风紧系着家庭的兴衰安危,即使家里有奴婢,子弟们也不能够随便差使。他曾对自己四个为官的弟弟说:从古到今,官宦人家,大多只有一二代就享尽荣华了,主要的原因是子孙后代开始

骄横跋扈,紧接着就是荒淫放荡,最后就落得个抛尸荒野的下场。他再三告诫自己的子孙后代,必须是“半耕半读,勤俭持家,以继承祖先的优良传统”。他在位20年,死的时候留给子孙、家族的只有两万两银子。除了乡间一个老屋之外,没有建造别的房子,也不曾买过一亩田地留给子孙。《颜氏家训》里说“父子之严,不可以狎;骨肉之爱,不可以简。简则慈孝不接,狎则怠慢生焉。”说明对于家庭的德行,长辈必须以严肃、正气的态度来关心它的沿袭和传承,一丁点都马虎不得。

封建官员对家风问题尚且如此清醒,更何况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人。然而,不得不严峻地看到,眼下有些官员放松家风建设、放任家属教育,使他们“位尊而无功、奉厚而无劳”,在重大问题上任由亲属子女胡作非为,不

但不加阻止,甚至充当“保护伞”,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,造成恶劣影响。

家风不正,说到底是因为“主心骨”软了、斜了、乱了。由于不良社会风气对党风政风的冲击和侵袭,一些官员自身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变形,从而淡化了宗旨意识,放弃了理想追求,于是哪还有家风建设和家属教育的理念和心思呢?

古语说“闾内不理,无以整外”。一个连自己的家都带不好的人,怎么能期望他服务百姓、造福一方呢?因此肩负“人民公仆”称号的各级官员,如若有志于“权为民所用、情为民所系、利为民所谋”,就应该铭记唐代诗人罗隐的名句“国计已推肝胆许,家财不为子孙谋”,以及李克强总理对政府官员的忠告,“为官发财,应当两道”。要知取信于民,从建设好家风始。



**关注公检法司
维护公平正义
服务百姓生活
推进法治进程**

公检法司

邮箱: zkwbzfb@126.com zkrbghc@126.com
监督热线: 15936909988 13838686789

做一位 符合程序正义的 大侠

言者有意

■周云

4月9日,一名红衣男子爬上广州小北路后勤医院旁的龙门架,与警方僵持近4小时。这时,一蓝衣男悄悄爬上龙门架,很短的时间将其制服,之后就消失在人群中,当时没有留下任何信息。日前,他的身份终于被“挖”出来了,他叫卢传旺,曾在部队当过侦察兵,现为广州某酒店保安,月薪2000余元。

卢传旺当天的作为,很让人联想到“侠”,无论是在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侠士,还是美国大片中身穿披风、内裤外穿的那位超人,其共同的特点是身手不凡,在最需要的时候从天而降,瞬间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事毕悄然离去,深藏功与名。

更重要的是,侠往往代表着正义,即所谓的侠义。侠的所作所为,总是能够满足人们对于公平、正义的期待。毫无疑问,卢传旺只身制服红衣男,传达着正能量。正如他所说,红衣男既有可能伤及无辜,也有可能伤及自己,因此他才果断出手,制止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悲剧。说卢传旺是现实中的大侠,一点儿也不夸张。而且我们所熟知的各种大侠,大多生活在传说中、影视作品中。而卢传旺是活生生的,就在我们身边,这怎么不叫人叹服呢?

然而与传说的完美无缺相比,现实中的卢传旺却要面对一些问题。这件事情的结局本身是完美的,各方都从中受益,没有人从中受到伤害。但现实的社会中,还有一个叫程序正义的东西。从这个视角来看,卢传旺的行为无疑有些冒险。警方与红衣男子对峙四个小时而不采取行动,无疑是在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,寻求万全之策。卢传旺的行为,则打乱了警方的部署。虽然他实现了警方想要实现的目标,但警方不能赞同他的行为:如果万一失手了怎么办?

因此一方面,我们必须赞赏卢传旺的身手,欣赏他的低调,更是要赞美他挺身而出的勇气。对他不应该进行苛刻的指责,甚至要进行褒奖。如果官方出于种种考虑不方便出面,那么民间是不是应该有所表示呢?至少,在舆论上,要给予正面的肯定。各种针对他个人的风言风语可以休矣。置个人安危于不顾,挺身而出的精神,是我们现在社会所稀缺的。过多的指责或苛评,可能会使得正气更加萎靡,侠义就真的只能永远存在于传说中了。

但另一方面,侠之大者,在于能够审时度势。现在毕竟已经是讲法治、讲程序的时代了。这是对公权力机关的要求,也是对每个公民的要求,卢传旺也不能例外。我们希望卢传旺,也希望每一位公民都有一种侠义的品质,能够“危难之处显身手”。但要在适当的场合,在法治的框架和程序中进行,做一位符合程序正义的大侠。

画中有话 小三攻防战

■文/小强 图/春鸣

近日,关于深圳海关副处级干部黄洲洲“包养两名情人,小三划伤小四脸”的消息在网上疯传。前天下午深圳海关网站挂出一条消息称黄洲洲已经被立案,同时停职接受调查。海关人士也向媒体证实了这一消息。

网传反腐三大利器:家中失窃、日记丢失、小三翻脸,前两种情况比较罕见,最后一种情况隔三差五就来一出,黄副处长的故事再次生动地诠释了这一点。

花心男子婚外乱搞最终身败名裂,小三却也并非全师而退,其间愁肠婉转外人焉知?一方面,要处心积虑讨好男人,以图“上位”大业,并时时提防大婆派出的正义之师的围剿,另一方面,又要防备小四、小五、小六等众多竞争者的偷袭。如此艰巨的攻防拉锯战,让小三那弱小的身子骨如何消受得起?所以,不少小三玩到最后,上位没成功,负心汉又恋上了小四,自己啥也没得到,逼得在网上晒图视频引爆内幕,让局中人“同归于尽”。

如此艰难的小三之路,还是不要走的好。



“官民比”应该怎么算?

■张贵峰

近日有媒体刊文称,一种较为普遍说法是中国“官民比”高达1:26,即每26个纳税人供养1名公务员。上述说法将国有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、机关工勤人员以及离退休干部都纳入公务员范畴,扩大了统计范围。严格意义上说,2012年底全国公务员总数为708.9万人,同时期中国大陆总人口135404万人,真正的“官民比”为1:191。同期英国为1:118,印度1:109.5。

针对“官民比”中的“官”,官方往往强调应该在“严格意义”上只计算“公务员”,而民间眼中的“官”,事实上指的则是所有“吃皇粮”意义上的“财政供养人员”。比如,最初给出“1:26”数字的国务院参事任玉岭,其当初的计算依据便是:

“当今吃‘财政饭’的总人数已高达4572万人,另外还有500万人仰赖于政府赐予的权力实行自收自支。我们的官民比已达到1:26”。

这种背景下,一再简单争执哪个“官民比”数字更准确,显然如同圆凿方枘、鸡同鸭讲,并没有太大的澄清价值和意义——因为双方所讲的原本就是同一口径语境下的同一回事,而真正更有价值的其实是,这样两种不同“口径”下的“官民比”计算方法,谁更加合理靠谱?

如果我们承认,从社会民生负担的角度看,与“民”相对而言的“官”,应该也只能是所有主要由纳税人供养、“吃财政饭”的从事公共事务的人员的话,那么,答案当然不言而喻。事实上,这也正是此前李克强总理强调“财政供养人员总量只减不增”,而非“公务员数量只

减不增”的道理和深意所在。

当然,站在理想的“公职人员就是服务员”、“政府公共服务也创造社会价值”角度来看,“官民比”是否合理,也不能完全只看简单绝对的官员或“财政供养人员”数量上的多寡,如果“财政供养人员”数量多,能带来更多更优质的政府公共服务、意味着政务水平质量的同比例提高,那么“官民比”比值高,也并不一定就是坏事。

但是,进一步更现实地站在政府公职人员也是公权力行使者,而权力又天然具有滥用膨胀倾向”的背景下,尤其是在目前我们仍未能真正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”的现实背景下审视,又必须承认,过高的“官民比”,更不必然自动意味着“更多更优质的政府公共服务”,而更可能的结果往往是“机构臃肿、人浮于事”。